



[在文学馆听讲座]

生命的智慧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在文学馆听讲座]

面对外来强大文明的挑战，满清帝国及后来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不断，中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现代化之路也几乎成了一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关注历史，关注未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ISBN 978-7-80106-706-7



9 787801 067067 >

定价：29.80元



[在文学馆听讲座]

生命的智慧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智慧 / 傅光明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8

ISBN 978-7-80106-706-7

I. 生… II. 傅…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②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I206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796 号

生命的智慧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 编: 傅光明

责任编辑: 于建平 杜语

封面设计: 野羊工作室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日期: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 朱向前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1
- 吕同六 但丁和他的《神曲》/51
- 张绪通 黄老哲学与生命智慧 /68
- 王 毅 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 /90
- 孙玉石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113
- 孙立川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 /127
- 雷 颐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 /150
- 刘梦溪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168
- 王 军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192
- 傅光明 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213



中国现代文学馆
www.chinamodernliterature.com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不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还是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就是有“诗人政治家”之誉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再过两天,5 月 23 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纪念日,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开馆纪念日。无论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还是打造文学馆的辉煌,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为此,我特地为大家请表一位军人、著名文学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教授,大家欢迎。

朱先生在文学评论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的理论批评自选集《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2004 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钟情于中国古代文化,书法成家,挥毫翰墨;围棋入段,在黑白子的博弈对局中体味传统文化的意境、性灵,他连自己的书房都起名叫“黑白斋”。近些年,随着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不断升温,朱先生开始思考和关注毛泽东书法和诗词中所蕴藉着的穿透时空、超越政治的恒久魅力。下面有请朱先生为表们演讲《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主讲人：首先，非常感谢傅光明先生对我的热情介绍和鼓励，也感谢文学馆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台。刚才听了傅先生对咱们讲座的回顾，了解到听众中有坚持听讲座好几年的，也有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2周年的前夕，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我深感荣幸。

先作个简单介绍，我并非一个中共党史专家，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毛泽东诗词，我的当行本色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军旅文学批评。这些年由一个题目讲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诗词，讲到古典诗词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诗词仅仅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准确地说，是去年1月17日下午在国防大学开始讲的，讲到今天正好40场了，确实受到一些欢迎。我觉得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向大家坦白说，我对毛泽东诗词确实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研究，所谓的一点儿功底就是40年前，我在1965年左右看的周振甫先生注释的版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虽然当时不大懂，却终身难忘，什么时候都能张口就来，那时我差不多十岁，按中国教育的说法这是所谓的童子功。应该说，去年开始讲毛泽东诗词，有点冒失，但“学然后知不足”，于是陆续恶补关于毛泽东诗词、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资料，读到现在，海内海外的、正面负面的、党内党外的大概有数十种之多，将近三千万字。这样一来，就搞得比较庞杂了，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跟我的研究生讲，已经讲到了八个课时。但是请大家放心，今天我会按我们讲座的时间来控制。

为什么叫“一种解读”？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对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区别于其他解读，包括主流的解读。比如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毛泽东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尽量不重复，我的个人解读也许不作政治的、历史的、军事的、道德的评价，而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文学艺术的角度切入，谈这种文化怎么形成毛泽东的性格，怎么形成他的魅力和智慧。从中多少也能体现出一些我文学批评的特点，即比较注重作家本体研究。

再简单交待一下我这个解读的基本框架，即：一、二、三、四、五。一是一个背景，二是两个代表，三是三个特点，四是四个“佐证”，五是五个来源。



【本馆文学批评系列】

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

以上算是开场白。

一 一个背景

先从一本书的尾声说起。这本书是法国的传记作家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是经过官方认可的，也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有这么两段带有总结性质的话：

“毛是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土地上居住的约四分之一的人类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他掌握着只有中国历代那些最威严的皇帝才能与之相比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短短一代人的时代所发生的浓缩了的变化，需要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毛具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他是政治家、天才的政治军事战略家、哲学家和诗人。”

这就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毛泽东。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谈到了毛泽东的诗词：“毛的诗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抓住了那个时代痛苦的、无法平息的精神。”^①这的确耐人寻味。

虽然该书作者对毛泽东诗词的其他一些评价并不恰当，但是他对毛泽东诗词与其革命生涯相互关系的看法却别具一格。他说：“毛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在东山高级小学堂的那段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格外有光彩，而且这种爱好继续伴随他度过了以后所有的动乱不安的岁月。这一爱好，也成为一种崇高的副旋律，调节了战争的野蛮，并使他从革命斗争的枯燥乏味的逻辑中走出来。”^②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很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写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专著、传记，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西方人看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约七十年前，即1936年。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其代表作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延安》、《毛泽东印象记》；第二阶段大约是在五十年前到文革前，主要有美国学者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1951）、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1966）；第三阶段是30年前毛泽东逝世至今，主要有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历史的巨人毛泽东》（1979）、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1980）。最新的就是法国学者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为写此书，他来到中国，花了五年时间走长征路，采访当事人，查阅资料。该书英文版1999



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随后译为法文、保加利亚文、捷克文、俄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本,这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毛泽东传记。但是即便包括这本书在内,我总的印象是,他们看中国的政治、军事、历史还差强人意,可一旦谈到文学艺术,就相去更远。这也是激发我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动力之一。因为东西方之间确有个跨文化传统的问题,不能苛求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入理解。

郭沫若先生曾对毛泽东诗词有过恰当的评价,即所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毛泽东除治理军国大事之外,业余爱好写点诗词,但也足以称得上是泰山北斗。这个话我认同,以郭沫若词坛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诗,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实毛泽东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个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导引世界风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接见赫鲁晓夫。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更是深居简出,常常在书房会见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还有,八十年代的影后刘晓庆出了一本书叫《我的路》,应该说是开了当代大牌明星出自传的先河。刘晓庆在这本书里坦诚地说,她少年时代的心中的英雄就是毛泽东。其实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年过七十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两个代表

(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

这又可以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本分、最勤俭,有些甚至是吝啬、刻薄的群体。他们这样做无非为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此点与中国革命有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的感受相通,他能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



【在文学中寻智慧】
——
——



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他 1927 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的理论发现，成为当时中共高层最具特点的一员。事实上，当时他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运”中坚，他们犹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主要形成于 1938 年至 1945 年的延安时期。它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比如说梁漱溟，1938 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泽东一见如故。其实，梁漱溟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把马列主义加以改造，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对毛泽东深有启发，也是毛泽东和梁漱溟持续 20 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大家回忆一下，在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电报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他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之初。这样的局面、处境，怎么传达给广大将士？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等代表性人物，都是大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读得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



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童子功，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③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生运动，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其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泽东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例如，延安整风时，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讲了这样的话：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④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嚣张气焰。



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明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明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举，是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四个小时讲八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泽东和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甚远，隔膜甚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毛泽东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二）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毛泽东从四五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八十年的书，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年代，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厕上、马上，一辈子手不释卷、嗜书如命。1939年，四十六岁讲到学习的时候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364日。”毛泽东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有案可查的毛泽东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24个小时。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患白内障，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是由芦获来给他念书。1976年9月8日凌晨5点50分，这时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泽东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又昏过去了，直到去世。^⑤

就这个细节我在想,别说一个伟大领袖,或者说一个皇帝,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又有几个能像毛泽东这样读书的?而且是真读,读到烂熟于心,张口就来。再举一个例子,据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她第一次到“美庐”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然后说:“哦,水静?不对啊,违反辩证法,水是动的,怎么是静的呢?”然后就聊天,问她“爱读书吗?”回答说:“喜欢读书”。“读《红楼梦》吗?”“读过。”“《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人物啊?”水静傻了。

毛泽东随即自言自语说,一共写了327个人,其中剥削阶级是30个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后再告诉她“《红楼梦》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静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她经过了开始的紧张之后,静下心来观察,发现在毛泽东的茶几上摆了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她几十年后写回忆录时,还在感叹这件事情,说毛泽东日理万机,尤其在庐山会议期间,竟然还有这份雅兴闲情看《安徒生童话集》!⑥

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毛泽东。

我们更熟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传承。一是书法,二是诗词。

先说书法。文以载道,书以传文;道之无文,载之不远;文之无书,传之无采。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普通、最实用、同时又是最高深、最复杂、最变幻莫测的线条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三百五十多个皇帝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够得上书法家的水平。作为中国这么一个文化大国,一国之尊如果字都写不好,是很丢脸的事情。比如唐太宗,我们现在读的《兰亭集序》,是褚遂良的摹本,欧阳询的摹本,王羲之的真迹哪去了?被唐太宗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书法大字典》,可以碰到很多唐太宗的漂亮的字。再一个,宋徽宗创造了“瘦金体”,快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练“瘦金体”。前不久我无意间看到他的儿子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一封长信的真迹的影印件,内容是商讨抗金大计,那书法是神品啊,写得好。到了清代,大家就更熟悉了,十二帝个个都堪称书法家,乾隆御笔遍布名山大川。到了毛泽东,更是自创狂草一体,虽出于怀素和张旭,但又不拘法度,随心所欲,另辟蹊径;虽谋篇深远、布局和谐,但又狂放飘逸、势若奔雷,性格峥嵘、气象万千。

再说诗词。诗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源头,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过来,由简到繁,由雅到俗。当然,可能看小说的人远远超过了读诗词的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名



【在文字中寻找智慧】

—————



著里面,不管是写人物、写场景还是写事件的段落,不管写得多么热闹,多么精彩,最后总是由“有诗为证”来结尾,好像诗没出来,这个事情就搞不定,怎么写都收不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诗词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泽东的文化理念也大体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泽东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这其实只说了一半,只说出了表层思想,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他亲口对梅白说出来了:“(给臧克家的信)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⑦

其实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远不止书法和诗词,比如还有传统戏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纪念馆中保存着他生前爱听的传统戏曲的唱片和磁带共两千多盒(张)。毛泽东一生酷爱京剧,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时,他哭出了很大的声音。另有一次,他看谭富英、裘盛戎的《捉放旅店》,其中陈宫有唱词曰“凌烟阁上美名扬”。他说:“凌烟阁为唐太宗所建,汉朝的陈宫怎么能唱得出来?”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泽东看谭富英的《失空斩》,谭扮诸葛亮时胸前配一挂檀香木佛珠,问其来历,乃谭祖父谭鑫培当年进宫演出为西太后所赠。他说:“三国时佛教还没有传进中国,怎有佛珠?”因此改之。^⑧

分说了书法和诗词之后,现在我要来一个总说。即传统文化的四性:稳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学界风行之后,我们经常谈所谓“大历史观”。其实,所谓大历史观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长度问题,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里研究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货币政策,面对当下,可能以10年、20年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个好”,其实是对新中国前30年人口政策失误的一个反拨,矫枉而过正,不得已而为之。只生一个是不好的,因为它打破了两两相传的人口平衡,现在小两口来赡养四个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会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再过30年、50年,可能我们就要调整到“只生两个好”了,



【在文学部所讲过】

这就是一个小历史观,大概以百年为期。生态问题,就至少是个中历史观了,起码得以五百年为期。文化的调整周期更长,至少是以千年为期,这就是大历史观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不管是李敖还是连战、宋楚瑜还是郁慕明来大陆发表演讲,提出要尽量多背一点唐诗宋词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唐诗宋词是好东西。《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是好东西,国民党说好,共产党也说好,毛泽东喜欢,蒋介石也喜欢,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稳定性,它超越党派之争,稳定于意识形态之上。在中国,不管党派间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同,但一追溯到传统文化,就相互认同了。因为唐诗宋词、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深重底色,它已经渗透进了中华子孙的血液和骨髓。它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世界的,属于所有炎黄子孙的;它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

我们再讲“穿透性”。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要说这个人皇帝当得很窝囊,政绩、人品,无从谈起。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况,李后主的妙语多多,什么“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什么“离愁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相信,只要汉字不灭,这些无上妙词就会伴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流传下去。

再说“覆盖性”。譬如古代战争有很多,什么巨鹿之战啦、淝水之战啦、长勺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夷陵之战啦,等等,但是哪一个战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战。为什么?因为有《三国演义》,但更早是因为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就够了!虽然今天在湖北有两个赤壁,苏东坡所咏赤壁可能还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战到底是在哪个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这都没关系,文化“赤壁”已然名扬天下。

再举个更小点儿的例子,江西赣州的郁孤台,原本毫无知名度。而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词人辛弃疾被下放到那里,很郁闷,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有一天转到了郁孤台,凭栏远眺,悲从中来,大发感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



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够了，出了两个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此，郁孤台——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脱颖而出。今天谁去了赣州，一定要去郁孤台。其实就是个小上台子，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文化积淀，谁也不敢小看它。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稳定性和覆盖性，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就是名山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纪昀、和珅代笔，但都归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们来传世啊。诗无好诗，湮灭无闻。真正起到了传世作用的是“乾隆御笔”，它们遍布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你想躲都躲不开，想不知道都不行。还有那个《曾国藩家书》，围剿洪、杨之际，戎马倥偬，秉烛夜书，天天批改快马送到的子侄辈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国藩教子有方，代代出进士，他的家书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写这些家书时，有没有一种传世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读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备的《曾国藩家书》。再举一个《胡适日记》。胡适之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回国，成为最年轻的北大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名士意识油然而生。他的日记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后世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备的《胡适日记》。

毛泽东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既可以做元首，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一直主张“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授界的谈话，论及康有为、梁启超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借用此说是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我们说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或文章更多体现的是集体智慧。那么什么不是集体智慧呢？毛泽东诗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只有诗词才是真正个人化的、心灵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只有诗词不需要讨论，也没有人能代

得了笔。以我书写我诗历来是中国文人一个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诗人兴会,余音绕梁,翰墨流芳。苏东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诗、词、文、书、画样样一流,在当时人们就把他的诗书真迹看作无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黄州时期,当时的太后、皇后经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诗文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前后《赤壁赋》的帖就是这样的奉命之作。和历史上的许多文人一样,毛泽东也愿意把自己的诗词手书赠人,如《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毛泽东诗书合璧的精品。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毛泽东生前为什么没有钦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周振甫注释的版本只有37首。为什么只出了37首?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于重视,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一生戎马生涯,决断无数,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诗词来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这个情况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看毛泽东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见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把他的诗词拿出来作系统修改,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贺新郎·别友》,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就这个例子我又敢说一句话,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像毛泽东如此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创作。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面我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诗词余事”;另一方面,大量的事例又告诉我们,并非余事,毛泽东书案旁的书架上,经常摆一些诗词工具书以及他的诗词手稿。这就自然让我们想到他常常修波他的诗词。

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



【在文学聆听智慧】

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